

主持人语

发生在 20 世纪末的东欧剧变是改变欧洲政治经济版图的重大事件。剧变以来，中东欧国家全体向“西”看，开启了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全面转型，转型的广度和深度为“转型学”提供了新的材料和知识。站在中东欧转型 30 年的节点，在民粹主义和疑欧主义兴起、欧洲政治经济秩序出现新异动的背景下，回顾与反思中东欧国家转型以来发生的变化、付出的代价及其发展前景尤为重要。

本期工作坊与会学者均提出了各自鲜明的观点，并对此进行深入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南泉认为，俄罗斯的体制转型与制度变迁是统一的，这种转型并不是在原来的框架下进行改革完善，而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私有化政策的失误，大量垄断经济组织的出现，体制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没有同时进行，缺乏良好的投资环境，制造业和加工业衰退等都是阻碍俄罗斯经济转型的主要因素。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徐向梅指出，俄罗斯制度转轨是以激进方式完成的。政治摆脱前期的动荡保持了稳定，经济上摆脱衰退恢复增长，但跌宕起伏、危机频现，始终无法走上稳定增长的轨道，且目前看来结构问题积重难返。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马细谱认为，对于东欧国家转型是否成功的评价标准不是加盟入约，也不是左或右翼政党上台，更不是实行何种社会制度，而是社会的现实情况、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以及发展前景，对其研究要具

体国家具体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孔田平认为，中东欧国家已经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经济转轨进程已经结束；中东欧作为新兴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市场经济不同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中欧国家、波罗的海国家与西巴尔干国家之间的分化十分显著，这种分化不仅体现在市场经济体制成熟度的差异上，也体现在经济实绩的差异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东欧研究室主任高歌指出，中东欧国家政治转型指的是国体上向资本主义、政体上向西方民主政体的转型。国体转型随东欧剧变结束而完成，政体转型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西安外国语大学副教授姬文刚介绍了中东欧左翼政党的发展脉络。他指出，受社会主义历史遗产等因素影响，在当前整个欧洲左翼颓势明显，民粹主义、极右翼等极端性、反建制政党普遍崛起的背景下，中东欧左翼必然会维持相当长时期的低迷状态，处于一种党内分歧、党外多变的复杂环境中。

我认为，通过考察中东欧转轨 30 年的成效，可以得出的启示有：社会转轨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法律、制度框架的变革可以短期内实现，制度的巩固却需要长期的历程；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性并不强，政治民主并不能在短期内带来经济繁荣；转轨的前提与转轨后果之间存在着较强的关系，政治稳定性与经济发展也存在着密切关联，政府稳定性越强，转轨之路越平坦，成效也越好，而政治分裂和政权动荡则会带来社会发展的曲折乃至严重衰退。

本期工作坊紧密围绕“原苏东国家转型的回顾与反思”主题展开，与会学者通过发言与讨论达成以下政策参考点：改革需要有韧性，政策需要持续性；改革要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让人民群众受益，这是执政党能够执政和支持执政的基础；原苏东国家转型不可简单以成败论，在转向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中东欧国家也面临着严重的问题；民粹主义的产生是全球化和各国转型的综合产物，主要支持者是中下层群众，不能简单否定。

与会者建议，原苏东国家大都是“一带一路”参与国家，厘清原苏东国家的现状，可以为中国科学地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中国企业在相关国家开展活动时需要考虑原苏东国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项佐涛

2019年11月15日

“博雅工作坊”第26工作间

“脱苏向西”三十年：原苏东国家转型的回顾与反思

2019年11月8日

本期工作坊邀请到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西安外国语大学、四川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参与研讨。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教授在致辞中首先对与会者表示欢迎，并向与会者介绍了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的学术交流与人才培养工作。他表示，苏联解体后，原苏东国家大部分转向西方，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的发展转型问题成为当前受关注的热点问题，但目前在这一领域国内研究仍显薄弱，希望通过本期工作坊促进国内学者的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南泉的发言主题是《俄罗斯体制转型若干问题分析》，主要围绕俄罗斯转型过程中各阶段的主要任务和基本问题两方面展开。他表示，俄罗斯转型开始的具体时间是1992年的1月2日，以第一次大面积放开价格为标志，呈现出激进改革的特征。

俄罗斯的转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叶利钦担任总统的8年，主要任务是摧毁苏联计划经济基础，建立市场经济的框架和西式政治体制。经济方面的基本问题主要是私有制问题。截至1996年，通过私有化改革，俄罗斯70%的企业实现了私有化，私有经济占GDP的60%。尽管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转型危机——八年间GDP下降了40%，但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建立了不可逆转的市场经济体系，为俄罗斯之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是普京担任总统时期。2000年普京上台后，鉴于叶利钦时期经济呈现的无序与混乱，普京时期经济转型的主要任务是建立稳定、有序、制度性的市场经济，同时在政治上加强国家权力，稳定国家政治，为今后的改革铺平道路。普京前8年的经济改革主要集中在两个基本问题上：一是税收体制改革，即大幅度降低税收，使企业有更多资金发展经济；二是土地私有化，当时的经济学理论认为，如果土地不能实现私有化，生产要素就无法进入市场，市场经济将难以形成。土地私有化为俄罗斯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

第三阶段是俄罗斯政治的“普梅时期”，即普京与梅德韦杰夫搭档的时期，这一阶段俄罗斯经济建设主要围绕创新经济和经济现代化展开。围绕这个目标普京制定并调整了一系列政策。

陆南泉认为，评价俄罗斯28年体制转型问题时，应该关注两点：一是俄罗斯的体制转型与制度变迁是统一的，经济市场化与政治民主化同步进行；二是改革过程中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由此造成目前俄罗斯经济的困难。俄罗斯转型存在十大问题：第一，俄罗斯私有化政策存在失误，私有化过程中大量国有企业的领导集体和经营方式没有被触及，企业难以适应过于迅猛的私有化改革。第二，垄断经济组织大量出现，官商勾结现象严重。第三，体制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没有同时进行，经济增长方式日趋单一。第四，制造业和加工业衰退，国家缺乏核心竞争力。第

五，企业规模过大，中小企业生存空间缺乏，企业结构不合理导致俄罗斯经济缺乏竞争力。第六，落后的增长方式没有改变，劳动生产率过低。第七，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交通运输能力受到制约。第八，腐败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第九，国有企业政策缺乏连续性。第十，投资环境长期得不到改善，在经济合作中过分强调利益最大化，缺乏双赢精神。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研究员徐向梅的发言围绕三个问题展开，分别是“政治制度构建与政治生态演变”、“市场经济体制构建与结构性经济增长困境”以及“俄罗斯将向何处去”。

徐向梅认为，俄罗斯确立总统制后，政治生态演变主要涉及总统与国家杜马之间的关系。叶利钦时期，总统与杜马之间关系紧张，叶利钦受杜马的掣肘；普京时期，总统与杜马关系趋于理顺，普京的支持率一直保持较高水平，政局比较稳定。

市场经济建构方面，俄罗斯快速完成了制度转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美国于 2002 年承认了俄罗斯市场经济的地位，经济由此实现了快速发展，保持了较长时间的高增长。2008 年经济危机后，俄罗斯经济一直处于危机、衰退、恢复、增长、再危机、再衰退、再恢复的状态，没有步入稳定增长的轨道。

对于“俄罗斯将向何处去”，徐向梅给出了以下基本判断。第一，根据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 2016 年 3 月和 12 月的民调结果，受访者中有 64%的人明确表示支持保留苏联，但其中 60 岁以上的人群居多。另有 68%的人认为不可能以旧

的形式重建联盟，但其中 52%的人支持以某种新的形式重建联盟。这说明有关俄罗斯人普遍怀念苏联的说法言过其实，怀念苏联的主要是当年支持保留苏联的老年人，随着岁月的流逝苏联对俄罗斯而言已经成为历史，与此同时，以新的形式重建联盟的可能性事实上也不存在。

第二，2012 年普京对民主进行了具体界定，他指出俄罗斯赞同民主的普遍原则，但俄罗斯的民主必须符合国民自治的传统和人民权利，俄罗斯民主不应该是外部强加的标准，国家的社会基础不能被动摇，民族发展的连续性不能被打断，主权以及公民权利不能被损害。由此而言，俄罗斯的政治传统对其民主政治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第三，俄罗斯社会现状与俄罗斯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分配形式有关。俄罗斯社会目前国有经济比例上升，私有经济后退；二次分配比例上升，社会保障水平较高。这体现出俄罗斯政府社会建设的目标，即建立具有俄罗斯特色的社会制度。

第四，单纯从 GDP 角度衡量，俄罗斯经济总量很难排进世界前 10，但如果综合国土、自然资源、人力与社会资本等多种因素，俄罗斯仍然是世界强国。目前来看，单纯依靠能源出口发展经济，俄罗斯的未来复兴仍是一个未知数。

总而言之，俄罗斯是苏联的继承者，转轨以来它一方面尽力去苏联化，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传承了苏联的遗产和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它一方面向往西方的自由，另一方面又崇尚东方的威权，因此在未来向何处去的选择上存在不可避免的纠结。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马细谱的发言围绕中东欧国家社会转型问题展开。他指出，对中东欧国家要具体分析，不同国家的转型过程和问题各有不同，要站在不同角度评价中东欧国家的社会转型。他强调，在研究中东欧国家社会转型过程中要关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以及国家内部的不同力量，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中东欧国家社会转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东欧转型的前十年，属于政治转型时期。特点是局势混乱，生产滑坡，经济困难，社会动荡，无政府主义泛滥，人民思想混乱。第二阶段是 2004 年至 2008 年，属于经济转型时期。中东欧国家纷纷加入欧盟，经济实现了转型发展，产权制度上实现了私有化，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增速保持在 5% 左右。第三阶段是 2008 年至今，属于外交转型时期。受 2008 年金融危机和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中东欧国家开始调整其与欧盟的关系，要求更加公正、平等的权利和地位。

中东欧地区不同国家的社会转型具有不同特点。中欧的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民生活富裕。东南欧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经济比较落后。前南斯拉夫地区各国也各有不同，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作为欧盟成员国，国内人民生活水平较高，塞尔维亚、北马其顿、黑山等国相对落后。此外，科索沃、波黑的国家建构至今尚未完成。总体而言，评价中东欧转型问题时不能将中东欧国家视为一个简单的整体，要具体国家具体分析。

中东欧国家社会转型中存在不同的问题，需要用新的标准去评价转型。其中，人民满意度是一条重要标准。总体而

言，中东欧国家人民对目前的社会状况比较满意，尽管游行示威频发，但这些游行示威主要是经济性的而非政治性的。因此在观察中东欧国家时不应片面的按照经济或者政治派别去理解，应该关注人民对社会生活的满意程度。

马细谱指出，在研究中东欧国家时要避免非此即彼的心态，要用辩证的眼光看待问题。以波兰为例，波兰需要的安全环境只有美国才能给予他，因此对于美中波三国关系要有理性的认识。总体而言，不应以中国为中心的视角去看待中东欧国家，而应深入这些国家社会内部，理解各国的社会现实和民众需求，以此推进相互间关系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孔田平的发言主题是《中东欧经济转型：反思与展望》。

他认为，截至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多数中东欧国家已经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各国通过宏观经济稳定化、经济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等手段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从产权制度上看，目前各国私有产权占主导地位；从经济决策角度看，经济决策不是由行政机构制定，而是由厂商自主决定，有效实现了分权化；从制度建设角度看，中东欧国家建立了包括法律制度、统计制度、审计制度、宪法制度在内的多个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制度。

中东欧国家市场经济体制的特征有三点。第一，市场主导经济生活，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极小。第二，经济规模较小、开放性较强，除波兰外，中东欧基本都是小型的开放性经济体，它们高度依赖西欧资本市场和技術。第三，社会主义时期建立的福利制度在最初的转轨过程中尽管受到一

定影响，但仍得到保持。

经过近 30 年的发展转型，中东欧各国间差异较大，出现明显分化。从统计数据看，目前形成了三个梯队。第一梯队主要是波罗的海国家和中欧国家，其中中欧国家包括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第二梯队主要包括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第三梯队主要是西巴尔干国家，包括塞尔维亚、黑山、北马其顿、阿尔巴尼亚。一些学者认为这种分化与地理位置有关，距离西欧发达国家经济中心较近的国家经济发展较好，远离欧洲经济中心的边缘国家其发展存在问题。也有观点从文化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解释，认为新教和天主教的国家发展最好，其次是东正教国家，最次是伊斯兰国家。回顾近 30 年的发展轨迹，西巴尔干国家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比较严重，发展状况也最不乐观，因此这一观点也符合事实。

孔田平指出，不能陷入地理决定论或者文化解释论的桎梏，上述问题的真正原因在于转轨的战略和政策。第一，从历史角度看，中东欧国家在历史上属于不同的帝国，不同的帝国遗产对它们有着不同的影响。奥匈帝国对中欧国家的经济产生着深远影响，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则对西巴尔干地区国家影响较大。第二，中东欧国家在转轨过程中采取了不同政策。以波兰为代表的中东欧国家采取休克疗法，匈牙利则采取渐进政策，从发展速度看，匈牙利相较于波兰处于落后状态。第三，欧洲化对这些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过去 30 年间中东欧国家发生了两次重大的制度变迁，一次是 1990 年中东欧转型时期开始的全面制度变迁，另一次是 2004 年中

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的制度变迁。在后一次制度变迁中，中东欧国家获得了巨大实惠，欧盟资金对中东欧国家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孔田平认为，中东欧国家未来发展面临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问题。这也是所有转型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按照市场经济逻辑，国家应当保护私有产权、促进竞争，但金融危机后中东欧国家内部的国家主义势力有所抬头，不断冲击自由民主政治、自由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共识。

第二，中东欧国家的增长模式存在问题。建立市场经济并不是目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过去多数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依赖廉价高技能的劳动力，吸引西欧制造业投资，实现经济增长。但这种模式无法持续，由于中东欧国家生育率较低，劳动人口不断减少，且高技能劳动力向西欧流动，劳动力资源流失严重。

第三，中东欧国家面临着新技术革命的挑战。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电动汽车等新技术产业对国家发展提出新的要求，但目前大部分中东欧国家在这方面发展尚不完善，面临极大挑战。

第四，农村问题仍然突出。与西欧国家相比，中东欧国家城市化水平较低，城市化率不足 60%，大量民众生活在农村地区。这种社会结构影响了中东欧国家的政治环境，导致民粹主义右翼政府上台，比如波兰法律公正党和匈牙利青民盟的支持者基本都是农村地区的选民。

第五，人口问题严峻。一方面中东欧国家的生育率较低，

无法维持人口再生产，另一方面人口外流严重，大量劳动力流向西欧。由此导致一系列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尤其给各国的社会福利体系带来严重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东欧研究室主任高歌的发言主题是《对中东欧国家政治转型进展的观察与思考》。她指出，中东欧国家的转型目标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国体层次上向资本主义转型；二是政体层次上向西方民主政治转型。

中东欧国家在国体层次上的转型简单且迅速，在 1989 年东欧巨变发生后就已完成。具体表现为：颁布了新宪法或宪法修正案，确立了三权分立原则，实行议会多党制。但向西方民主式政体的转型则比国体转型复杂得多，耗时也长得多。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来，多数中东欧国家都已确立议会制和多党制，但近年来，这一进程在许多国家却出现倒退现象。比如匈牙利 2010 年以来青民盟领导的执政联盟在议会选举中已经连续三次获得了 2/3 多数的席位，但青民盟通过的基本法、媒体法等法规却被认为违背了欧盟的价值观。2015 年，波兰的法律与公正党在议会选举中也赢得了超过半数的席位，得以单独执政，其上台后进行司法改革，加强国家对司法的控制，这一做法同样被认为对欧盟的价值观构成威胁。

对于上述现象，高歌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第一，尽管匈牙利、波兰等国在政体转型上出现倒退，但它们并没有退出西方政体框架。

第二，政治倒退并非是中东欧国家所独有的，近年来在西欧国家也出现了民粹主义抬头的迹象，同样对欧盟的价值

观提出了挑战。之前有观点认为中东欧国家转型就是向西看，是模仿西方国家的体制，现在中东欧和西欧同时出现了政治倒退的现象，是否意味着中东欧国家和西欧国家出现另外一种形式的趋同？

第三，西方国家学者也承认，西方民主政体在核心原则以外，根据不同的条件、历史、文化也会有一些不同的表现形式。中东欧国家的政治倒退是否意味着它们对照搬西方模式的行为进行了反思，并转而去探索更符合自己国家实际的一种模式？

高歌表示，中东欧国家的政体仍是在西方民主的框架下，尽管对上述问题没有详尽答案，但纵观中东欧国家 30 年的政治转型历程，可以肯定的是，中东欧在转型开始时为各自设定的转型目标是一致的，即国体上的资本主义和政体上的西方民主政体。30 年间，中东欧各国的政治转型不仅在进度上不一样，并且到了今天其转型目标也不再一致。例如匈牙利，其领导人欧尔班就明确说“要民主，不要自由主义”，即非自由的民主国家，这一目标与原先各国追求的自由民主体制不同。这其中存在两类影响因素：伴生因素和初始因素。

伴生因素是和政治转型同时发生的因素，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经济转型。从经济绩效上看，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呈现正相关关系。转型初期因为政治转型引发经济衰退，在衰退的情况下极容易引起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以及对将要实行的民主政体的不满。随着经济转型走出困境、逐步恢复以后，它对政治转型的不利影响逐渐下降，此时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更多呈现出一种相互触动的关系。

然而，受 2008 年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中东欧国家再次面临经济衰退与经济困难，由此也再次引发政局的不稳和民众对西方政体的不满。

二是从追随苏联到回归欧洲的外交转型。除了塞尔维亚，中东欧国家都以加入北约和欧盟为外交目标，这对于中东欧国家的政治转型具有非常大的导向和规范作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转型的进度。但也正因如此，当中东欧国家入盟后，欧盟巨大的外部推动力就减弱很多，对成员国的惩戒作用非常有限，加之近年来欧盟自身发展面临多重危机，使中东欧国家政治转型获得了倒退的空间。

三是从联邦国家到主权国家的建构过程，这里特指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和南斯拉夫联邦解体以及一系列后继的主权国家的建立。国家建构作为政治转型的前提条件直接影响了转型进度。首先，独立越早的国家越有可能尽早地进行政治转型，并且取得进展。其次，和平建构的国家政治转型比较顺利，最好的例子是捷克和斯洛伐克。第三，认同程度高的国家政治转型比较快。

关于初始因素，高歌认为，中东欧国家政治转型的起点是实行了 40 多年的苏联模式。它们认为这一模式不仅不能适应中东欧国家的实际，也严重伤害了中东欧人民的民族感情。南斯拉夫联邦从苏南冲突后不再实行苏联模式，而是实行社会主义自治民主制。这个制度的一个缺陷是强调放权，以至于权力过于分散，联邦国家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因此南斯拉夫的巨变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民族矛盾导致的国家解体。但仅仅把初始因素归结为不满苏联模式是不够的，还应

把目光放在更久远的历史中。西方民主政体产生于西方独有的历史、文化、宗教当中。中东欧虽然与西欧一样拥有希腊、罗马基督教的渊源，但是随着罗马帝国的分裂特别是基督教会的分裂，受拜占廷文化影响，信仰东正教的巴尔干地区开始与西欧分道扬镳。再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占领巴尔干，这一地区更与西方渐行渐远，阿尔巴尼亚和波斯尼亚的教徒甚至皈依了伊斯兰教，相比之下受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和奥匈帝国治下的中欧地区则没有与西欧分离的经历。因此，并非所有中东欧国家都有与西欧相似的民主经历，近年来转型的倒退似乎也与中东欧国家西方民主文化和民主传统缺欠有很大的关系。

高歌指出，30年来中东欧国家无一例外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其向西方民主政体的转型则因伴生因素和初始因素的不同呈现出不同的进度和样貌。多数中东欧国家与它追求的西方民主政体之间仍存在或多或少的差距，并且这种差距近年来有扩大的趋势，但是考虑到民粹主义力量在西欧抬头，中东欧转型倒退或许会与西欧的这种趋势相互影响，共同对西方的民主政体构成挑战。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项佐涛围绕《中东欧转型三十年的浅思》进行阐述。

他首先谈到中东欧国家的民粹主义问题，表示在欧洲政治学家眼中，“民粹主义”是一个贬义色彩极强的词。要清楚认识民粹主义，就要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为什么给中东欧国家的一些政党或其主张贴上民粹主义的标签？是谁给他们贴了标签？谁支持民粹？谁又反对民粹？

通过搜集分析近年来中东欧各国的选举数据，项佐涛认为，支持民粹的大部分都是社会的中下层人士，也就是在转型过程中获得感不太强的群体。他们有很强的经济平等的愿望，有很强的过上富裕生活的理想，这些可能是政党在转型初期向他们灌输的理念。但 30 年过去后，由于生活和理想预期差距太大，他们要选择一个新的代言人，此时民粹主义就出现了，它以代表人民自居，但实际上它只是代表社会中下层人士，而不是全体人民。

很多数据都表明，民粹主义政党并没有抢夺资本主义政党的选票，而是原先很多社会民主党的支持者近些年将选票投给了民粹主义政党，所以形成了目前波兰、匈牙利、捷克等国家民粹主义上台的局面。项佐涛认为，中下层民众绕开传统政党选择新政党的行为不应被视为反民主的行为，不能因民粹主义就将这些政党看作是粗鄙的政党，不讲究所谓的精英主义的规则。

对于民粹主义政党的反对对象，项佐涛认为有两类：本国的精英和欧洲强大的资本。在中东欧国家的转型过程中，与西欧资本联系密切的精英们在私有化的过程中获得了巨大利益。如今，民粹主义者认为传统政党精英拿走了国家转型的成果，他们和西欧的资本拥有者是既得利益者，因此要反对他们。当下民粹主义和主流政党的较量是下层民众和社会改革过程中形成的精英的较量。

项佐涛指出，未来中东欧国家民粹主义的发展走向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民粹主义不会突破已有的政治框架。尽管欧尔班

说要民主不要自由，但他的很多做法和诉求依然是在已有的框架内进行小幅调整，并没有推翻转型以来形成的政治体制，因此原有的政治框架不会有太大变化。

第二，中东欧国家的社会分裂会进一步加剧。目前波兰和匈牙利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新格局，这些国家中的贫困地区选择了民粹主义政党，而一些比较富裕的大城市则支持非民粹主义政党，这就形成了较为严重的对立。如何平衡大城市与小城市甚至农村之间的关系，是未来中东欧国家政治层面面临的考验。

项佐涛认为，从 GDP 总量、人均 GDP 的增长和市场化与市场丰富程度看，中东欧国家无疑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大多数转型后的中东欧国家与西欧国家的差距尚未弥合，且一些国家的国际地位出现下滑，因此很难单纯地从经济角度评价这些国家的转型是否成功。首先，并不能从目前的数据中得出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其民主化程度有直接关联的结论。其次，当前的经济数据并不能反映激进的转型、渐进的转型和休克疗法之间有哪些明显差别。比如波兰、保加利亚等实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和匈牙利等渐进的国家在市场化、私有化程度方面的表现差不多。第三，政治的稳定程度对于国家的经济发展也有重要影响。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中东欧国家的政治稳定性和经济发展数据的统计，大部分国家政治稳定性和经济发展的相关性达到了 70%-80%，最高的是拉脱维亚，达到了 90%多，最差的是黑山，但也有 66%。

项佐涛指出，尽管受英国脱欧影响，但中东欧国家并不会脱离欧盟，因为在它们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欧盟发挥着非常

大的作用，特别是在金融领域。从外部投资看，中东欧国家也严重依赖西欧国家的资本。此外，欧盟的援助基金在中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也占据着重要比重。当前的欧洲是一体化的欧洲，即中东欧国家被捆绑在西欧国家尤其是德国的产业链上，由于社会主义时期形成的工业体系基本被打碎，所以中东欧国家目前处于欧盟产业链的下游，需要严重依赖于欧盟。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要进入中东欧国家，与它们开展“16+1”合作，可能会发现很难与中东欧国家在产业链方面进行对接。对于此，中国是选择与德国一道与中东欧国家开展合作对接，还是避开德国塑造新的产业结构甚至替代德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西安外国语大学波兰研究中心副教授姬文刚介绍了 30 年来中东欧左翼政党的发展，内容包括中东欧国家左翼政党 30 年的发展过程、选举表现、意识形态与政策主张、发展的影响因素和未来趋势四个方面。

姬文刚认为，左翼政党是中东欧国家政党谱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主要有两个类型：民族社会主义政党和共产主义政党，前者还可细分为改建社会党、重建社会党和新建社会党。左翼政党的概念较为复杂，无论从意识形态、组织类型、历史传承还是从党章、党纲、施政方案、党际交往来看，中东欧国家的左翼政党有独特的转型特征和鲜明的地域特色，在全世界也算是独树一帜。从政党数量看，新建社会党数量最多，其次是改建社会党，再次是重建社会党。从力量强弱来看，最强的是改建社会党，其次是重建社会党和新建社会党。

中东欧国家左翼政党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9年至1992年，称之为组织危机时期或面临重塑的阶段。整体上看，这是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政治环节，中东欧国家左翼政党总体处于非常态和被压制的边缘状态。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各个加盟国以及阿尔巴尼亚等国纷纷举行议会选举，原执政党失去政权，改旗易帜实现社会民主党化成为这些政党的选择。

第二个阶段是从1992年开始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称之为左翼政党的制度适应和复兴阶段。1992年起，陆续有左翼政党走上中东欧国家权力的中心，成为执政党。期间各中东欧国家在宪法和法律上已经完全确立了多党选举制，并相继完成了第一次议会选举，政党制度化框架基本建立。左翼政党之所以能够复兴与当时它们拥有的历史遗产有很大关系，左翼政党的地方组织虽然弱化但没有完全被取缔，它们的党员人数减少但并没有消失殆尽，其政党机器运转的优劣性是显而易见的。

第三个阶段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2005年，期间所有的中东欧国家都已完成多届议会选举，大多数左翼政党都有了多次执政经历。这一时期自由选举按照规则进行，选举结果也被左翼和右翼政党共同所遵守和尊重，败选一方能够和平地将权力交给胜选一方。各派政治家们懂得如何节制权力，尊重司法，学会应对媒体，整体上看这一阶段属于左翼政党的常规发展阶段。

2005年之后，中东欧左翼政党处于总体低迷阶段。一方面，大多数左翼政党的得票率和议席数不断下降，执政机会

大大减少，左翼政党联盟内部频繁出现分化组合。另一方面，左翼政党在不同国家发展呈现不均衡状态，比如被视为转型“优等生”的波兰、匈牙利、捷克三国，2005年后其左翼力量衰退较为明显，而转型一般的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经济发展水平较差的国家，它们的左翼政党却呈现出逆势上扬的趋势。

中东欧国家左翼政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有以下几点：

第一，独具特点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观。中东欧国家的左翼政党在其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各国左翼政党的政策主张既呈现出多样性，也存在着一些共识。独具特点的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观就是其中一个共同点。中东欧国家的左翼政党大部分同情并支持社会主义的多元探索，在价值认同上倾向于民族社会主义。中东欧国家的左翼政党不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只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实现形式上，它们大多数奉行民族社会主义或是以和平温和的手段推动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第二，保护弱势群体利益和赞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多数左翼政党的经济政策以保护中下层弱势群体利益为出发点，极力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一点体现在它们在转型早期对华盛顿模式的批判，主张国家与市场的结合，强调政府对市场的监管，知识产权形式的多样化等。总体上看，它们赞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波兰民主主义联盟、保加利亚社会党以及捷克社会民族党的政党纲领、价值观、目标和

原则当中都明确提出了保护弱势群体，捍卫福利国家的主张。

第三，支持欧洲一体化。大部分左翼政党都奉行亲欧盟政策，在理论上广泛认同欧洲一体化，主张欧洲团结促进经济发展，共享欧洲福祉以及密切欧洲各国的文化交流。在实际行动上它们也积极参与并推动欧洲一体化建设，全力支持所在国家加入欧盟，肯定欧盟价值理念，包括欧盟的经济定位和在全球秩序当中的定位。

第四，主张国际左翼组织的联合与团结。所有中东欧国家的左翼政党都加入了意识形态相近的国际左翼联盟组织，如欧洲社会党、社会党国际、进步联盟以及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等。一些左翼政党如捷克社会主义民族党更是同时加入了欧洲社会党、社会党国际进步联盟等多个组织，这一方面促进了欧洲左翼政党之间的党际交流，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情报分享和立场统一的考虑。

影响中东欧国家左翼政党发展的因素有以下几点：

一是社会主义的历史基础。左翼政党是首先受转型冲击的对象，在政党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三种趋势，第一种是主动与过去划清界限，以选举为主要目的强调新的政治身份，这其中以改建社会民主党最为典型。第二种是彻底从组织上断绝与过去的一切联系，这类政党以波兰最早的左翼政党劳动联盟为代表。第三种是承认社会主义历史的积极性，坚决不改变共产主义政党的组织和思想，最典型的是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在这三类政党中，第一类政党曾经有过短暂的复兴，组织上最为强大，但目前处于消沉状态；第二类政党的政治实践实际上是完全失败的。第三类政党则遭受了长期打

压而选择隐忍与坚守，但目前有新的发展趋势。

二是党员组织机构与群众基础。中东欧国家左翼政党大部分是前制度的遗留物，它们首先是一个群众性的政党，有稳定的全民支持基础。

三是政党稳定性和选民偏好易变性的矛盾。这一矛盾实际上是选举领域中动态性代议制的表现，但也给左翼政党出了一个难题：政党精英必须系统地回应选民偏好的多样性，由此导致左翼政党和选民之间脱钩现象的出现。

四是全方位地启动政党转型与执政政策的右倾化，导致核心选民流失。赢得选举进而执政成为左翼政党的首要目标，导致它们从群众性政党转向选举性政党，全方位政党和职业选举这种模式已经成为中东欧国家左翼政党深入转型的产物。

姬文刚指出，首先应肯定左翼政党在推进中东欧国家制度转型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其次，2008年以来左翼政党在既有问题加剧的情况下新问题相继涌现，其选民基础进一步被分散，它们选举得胜的概率不断下降。总的来说，左翼政党处于一种党内分歧不断，党外环境复杂多变的境况，其未来的复兴之路仍取决于自身的改革和能否适应不断变化的政治社会环境，在可预见的时间范围内它们的前景并不会太乐观。

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原航以多层动态建构的视角分析了中东欧对外关系的发展。

他指出，在转型研究中，关于国际关系的研究处于边缘化地位，更多的关注点仍在社会关系的研究上。但实际上，

人类社会的组织生活除了权力结构维度外还有其他结构，以国家为单位的国际社会也是如此。除了权力维度外，还有精神和观念层面的维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现实主义重点关注物质力量，基本上是以从中心到边缘的视角来看问题。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包括英国学派在看待国际社会的时候更关注精神层面的观念。因此如果我们转换一种视角来看中东欧国家的转型问题，可能会有更多发现。

原航认为，要讨论中东欧国家的转型离不开对欧洲乃至整个西方历史的考证。如果再进一步，从具体到抽象，会涉及到探讨人类社会的一些根本问题，一是人类活动是如何开展的，二是人类社会应该如何组织，也就是实然和应然的问题。

过去几百年中西方探索出了西式的现代化道路，在观念、政治、经济、对外关系四个层面出现了一系列影响人类的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等成果。这种探索使得西方在过去 500 年里获得巨大成功，形成了很多成熟的发展模式。同时，在对外关系方面，西方也通过殖民扩张乃至一战、二战与冷战等事件塑造了人类近现代史。与此同时，非西方文明面临着如何看待西方的问题。一方面，不少文明希望固守传统，比如东亚的儒家文明，中东、北非的伊斯兰文明，但另一方面它们又面临强大的西方影响力，由此产生了较为复杂的反应。非西方文明始终面临着是否要走西方道路的问题，在政治上就是指是否要建立西方式的民主问题。但是，这也导致了若干重大问题的出现，比如人类的现代化道路和目标是否唯一？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探索，一种看法认为是唯一的，这个标

准是普世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另一种看法则与之相反，认为世界是多样性的，存在例外论。

原航认为，转型的内涵是政治上从非民主政体转为民主政体，经济上从非市场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外延则是亨廷顿概括的三波民主化进程，但这是一个狭义的定义。转型的广义定义是指人类社会中一切促进人类解放，社会走向平等自由，权力受到平衡和制约，促进经济活力的过程。如果以此来看，转型的外延就会从第三波民主化扩展到人类在过去几百年中所经历的现代化现象。

对于中东欧国家转型的内外变化，原航指出，在转型的30年中，中东欧国家的外部环境也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同样可以用转型的角度来看待。比如在欧洲层面，苏联解体了，出现了一些新的国家，西方的欧洲一体化在推进，欧盟在过去30年里本身也在变化，不能将欧盟当作一个恒量，它实际上是一个变量，欧洲一体化除了扩大还有深化。此外北约也在变化，它也不是一个恒量，而是一个变量，北约和俄罗斯在持续进行较量。在过去30年里，地中海中东欧地区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土耳其趋于壮大并谋求加入欧盟但受阻，巴尔干地区形势日趋复杂。如果在研究中东欧国家的转型时忽视它们周边的变化，就难以认识中东欧国家转型的全貌。

从全球层面看，过去30年也是极其不平凡的30年，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格局正在发生权力转移。回顾国际秩序的变化，从冷战结束到2008年，凭借一枝独秀的国际地位，美国通过发动反恐战争，在中东等地区发动一系列颜色革命，推广“美式民主”，推动其主导的自由主

义国际秩序迅速扩张。2008年后美国、欧盟相继遭遇经济危机和欧债危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崛起，这是全球层面上的国际变化。

欧盟自身也在经历着转型。回顾欧盟的历史，早期的欧洲一体化是由资本家、政府领导人、国家元首等精英通过不断修订政府间条文来推动的。作为民众直接选举的机构，欧洲议会直到2009年《里斯本条约》签订以后才发挥出实质性的作用，因此欧盟一直面临着民主赤字的问题，而现在欧盟则希望补齐这一短板。

发言最后，原航介绍了中东欧国家对外关系发展的多重动态建构视角。他指出，除了国家层次，次区域层次、区域层次、国际层次乃至全球层次的行为体都在中东欧国家的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动态”则是指多重层次中行为体之间多向互动的过程。如果简单地看中东欧国家转型，我们会认为中东欧国家是在学习模仿西欧国家。但在接触更多细节后，我们能够看到中东欧国家的转型不是它们向西欧国家学习的单向过程，而是与西欧国家双向互动的过程，并且它们周边的外部环境中也有其他因素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作用。

因此，在多重层次研究中不能忽视除国家层次外的其他层次因素。比如地方层次，以波兰为例，波兰地方政府的权力在扩大与增强，国家的权力在分散，反映在对外关系中则表现为国家去中心化的趋势；在次区域层次，不能忽视维谢格拉德集团对中东欧国家的协调作用；在区域层次则体现为中东欧国家融入欧洲的区域一体化，参与欧盟的对外治理等；在国际层次，中东欧国家在过去30年受到了自由主义国际

秩序扩张的影响；在全球层次，西方和非西方的较量，国际秩序的转移，全球化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显现都对中东欧国家转型产生了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多重层次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它们的共同作用塑造了中东欧国家的转型和对外关系的发展。

讨论环节中，与会者围绕上述发言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钱乘旦：欧洲一体化有一个转折点，即欧盟东扩，范围扩至原苏联地区，结果给欧洲一体化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现在西欧国家出现的所谓民粹主义，就是普通老百姓对原苏联阵营中的那些人影响他们的就业、生活水平、文化非常不满，这样一来就使得欧盟内部出现了严重裂痕。这以后会对欧盟产生怎样的影响？对中东欧国家又会产生哪些影响？

孔田平：欧盟东扩对于欧盟的影响是有争论的，很多人认为是负面影响较大，但我认为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对于欧洲的统一，甚至对于经济全球化都有非常积极的影响。首先，中东欧将近一亿多人口加入到欧盟统一大市场中，带来大量高素质劳动力，对于西欧跨国公司的发展将起到积极作用。实际上，欧盟目前面临的安全危机、难民危机、债务危机并不是由中东欧国家新成员造成的，更多是受西欧国家内部问题及社会情绪变化的影响。

英国退出欧盟后中东欧国家不会选择退出欧盟。尽管波兰执政党是主张离欧的，但支持留在欧洲的民众占比很高。匈牙利也一样，政府和欧盟就一些问题发生争执，但实质上是其政府与欧盟的讨价还价，民众并不愿脱离欧盟。

姬文刚：对于民粹主义的看法的确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民众反对精英是目前一种大家普遍的共识。所以我觉得民粹主义它在中东欧尤其是波兰、匈牙利这些国家仍然会成为一段时间的主调，甚至会主导政坛。在当前形势下，一些国家中下层的老百姓或者选民需要寻找一个他们认为能够代表他们利益或者为他们发声的政党，民粹主义政党在这些国家仍然有生存空间。

原航：中东欧民粹主义和西欧的民粹主义是不是一回事？我觉得这个问题提的非常好，民粹主义是什么？如何认识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和民主是什么关系？民粹主义和革命是什么关系？

孔田平：民粹主义是过去 10 年世界政治的风潮，代表有美国的特朗普、匈牙利的欧尔班、波兰的卡钦斯基，他们的政治理念非常相近。如果从世界政治变迁的历程看，中东欧算是民粹主义的先行者，并且在这方面中东欧与美国还有一些互动，比如特朗普当选时欧尔班曾给他打电话表示祝贺。目前欧洲的民粹主义不单纯是一般意义上的民族民粹主义，更多的是身份认同、身份政治的一种表现。

项佐涛：全球化带来资本跨国的流动，导致两个结果。一是过去欧洲老牌国家的资本前往税收低洼地带投资，本国的财政收入受到影响，国家越来越没钱，所以才有主权债务危机。二是在普通人看来，资本的流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普通民众的就业机会，收入没法保障，原本作为社会稳定器的中产阶级开始变得没钱，变得更加向无产阶级政治行为靠拢。与此同时，全球化时代的互联网使欧洲民众在面对移民问题、

难民问题、东欧问题时感受特别深，导致他们对本民族、本国家的身份认同日趋强烈，有很强的排外心理。具体到东欧和西欧，如果从反精英的角度看，民粹主义在这些地方的表现没有太大区别，但对于东欧人来说他们更关注经济问题，而对西欧人比如德国人这些收入相对较高的人群来说，他们更多强调民族认同的问题。

项佐涛在总结发言时表示，感谢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为国内研究中东欧国家的学者搭建了一个包容开放的学术交流平台。北京大学之大就在于它能包容不同的学术观点，在争论与碰撞中产生思想的火花。在本期关于中东欧转型的工作坊中，各位学者都讨论了许多深刻的问题，提了许多关于中东欧国家研究的宝贵意见，我们应该将这些宝贵的东西深化吸收，以待下一次学术会议的召开。